

司徒雷登在中國

(本文插圖刊第69、70頁)

●徐天淦

創辦燕大桃李芬芳

司徒雷登是一個出生于中國杭州的美國人。作爲教會的傳教士，後來成爲燕京大學的校長，直到被美國政府任命爲駐華大使，他的一生的事業，可以說是與中國的命運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。如今，司徒雷登雖已作古，但對他在中國所從事的全部活動，歷史將會給他做出公正的評價。

燕京大學最初是由美國教會在中國創辦的北京匯文大學、通州協和大學及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于一九一九——一九二〇年合併而成。隨後，紐約董事會正式任命當時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博士爲校長。校址仍沿用匯文大學與協和女子大學的舊址。不久，司徒雷登獲得一筆獎金，在圓明園附近購得一座園林，一九二六年海澱燕園以未名湖爲中心的新校舍建成，遂遷新址，即現今的北京大學所在地。

據說，幾所學校合併之後，對大學的命名有過一番爭論，直到蔡元培和胡適提出『燕京』二字，才最後被採納。

一九二六年，教育部有令國內各級教會學校

應以國人爲校長。經燕大校董會決議：聘請吳雷川爲校長。吳雷川爲清末翰林，後成爲基督教徒。司徒雷登對他非常敬慕，推崇備至。但燕大的創設，美國人捐助頗多。這樣，對我國教育部稱吳先生爲校長，司徒雷登爲校務長；對美國托事部（即校董會）則稱吳爲名譽校長，稱司徒雷登爲校長。

在本世紀三、四十年代，燕京大學曾盛極一時，蜚聲中外。除原辦的文、理、法三學院和附設的宗教學院及協和醫學院的醫預科和護預科外，還增設了工預科，準備發展爲工學院。很多學系并招了研究生。

爲什麼學校能取得如此大的發展？究其原因，主要是：學校有一套科學的教學體系，雄厚的師資隊伍（如吳雷川、陸志韋、洪煥蓮、鄭振鐸、顧頡剛、郭紹虞、許地山、吳文藻、外籍教授高厚德、班維廉、夏仁德、賴璞吾等都是中外知名的學者），濃厚的學術氣氛以及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。這樣，就吸引了衆多的莘莘學子包括海外歸來的僑生。

燕大不愧是一所『人才輩出』的高等學府，

從這裏造就出許多學者、名流、專家。在國內外、在各個領域工作着的燕京人，許多是起着骨幹作用的。目前，燕大校友在大陸各地尚有三千多人，還有部分校友分散在港、澳、台灣或遠在異國他鄉。

留在陷區照顧青年

一九三七年『七、七』盧溝橋事變後，日本侵略者很快以武力佔領了華北。在國民黨政府的鼓勵下，平津兩地許多高等學校紛紛南遷或內遷。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大學在昆明組成了聯大。後來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高等學校亦是如此。這時，燕京自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：內遷或是留在北平？據一位燕大校友說：「盧溝橋事件之後，日軍佔領華北。而司徒雷登早于一年前去美國時，商得美國托事部和羅氏基金會的同意，決定在淪陷區繼續辦學。」

這可以說明，不管華北淪陷與否，司徒雷登是要繼續把燕京辦下去。這個決策從以後的效果來看，應該說是正確的，雖然也是不得已的。因爲它至少爲華北廣大青年提供一個自由求學的淨

士，為抗戰的後方培養一些人材。更進一步，還為敵人佔領區的地下抗戰力量提供一個隱蔽所或聯絡站。

毫無疑問，這樣做必然會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滿和敵視。他們千方百計，妄圖插足燕京，經常向司徒雷登校長（為了應付日本侵略者，原來的校長司徒雷登代替吳雷川出任校長）施加壓力，建議燕大接受日本教授，分担校務。司徒雷登沒有答允，以語言困難等種種借口而婉言拒絕。其間，各種交涉、摩擦不斷。後由哈佛燕京學社推荐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教授給燕大，才將這一棘手問題加以解決。

在與日軍周旋的同時，學校成立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，幫助一些學生去大後方和解放區。司徒雷登對此是極為支持。他曾明確地說過，凡是自願離開淪陷區的學生，無論是要去大後方或要去解放區，都由他們自己決定。不管是哪裏，凡有經濟困難的，都可由學校給予資助。此外，凡是要走的學生，臨行前他都要在臨湖軒設宴送行。會上，他不止一次地說，他希望燕京大學的學生，無論是大後方或解放區，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到橋樑作用，以加強合作，共同抗日。但實際上，司徒雷登是更加傾向國民黨的。淪陷期間，他曾多次輾轉飛往重慶，會見蔣介石。回到學校後還在一部分人中間傳達過他和蔣介石見面的情況，他相信蔣介石是抗日的。

被繫三年始獲自由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國主義者偷

襲珍珠港，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。

當天，日本軍閥按照預謀的計劃，以「萬惡的間諜機關」的罪名，立即佔領了燕京大學。司徒雷登和中外教師、職員及學生三十多人遭到逮捕，全體學生則被趕出燕大。秀麗的燕園後來就成了日本軍官的療養院。

在監獄中，日本侵略者用盡了威逼利誘的各種伎倆，讓被捕的人出山為敵偽政權塗脂抹粉，結果是大失所望。師生們大義凜然，不畏強暴，絕不屈膝事敵，充分體現了中華知識分子的高尚民族氣節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，雲開霧散，光明重現。氣焰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勝利的一天終於盼來了！八月十六日，被日寇關押在北平三年的司徒雷登獲得自由。第二天，他立即邀同原燕京大學在北平的教職員，商討有關接管校園、清查校產、召集舊部、籌備復校等事宜。

為主效命好夢難圓

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，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，司徒雷登被馬歇爾看中，被美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大使。這不是偶然的，因為他是一個中國通，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，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，同中國各界人士尤其是一些領袖人物有過交往。他愛中國，但更愛美國。作為美國在華利益的代表，他必須執行美國對華政策，他支持得到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內戰。

但是，戰爭的進程，並不像美國和國民黨所預料的那樣。這期間雖有過暫時的勝利，但由于政府內部勾心鬥爭的傾軋和其他因素，前景並不樂觀。這一點，司徒雷登是看得很清楚的。他在

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向國務院提出的一份報告中，曾寫道：「象徵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，資望已日趨式微，甚至目之以過去的人物者……。」

隨着局勢的發展，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權開始失去信心。美國駐華使館轉交了杜魯門總統給蔣介石的一封信，信中表示，美國政府已經做了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，但是對於每況愈下的局勢，不過揚湯止沸。對於今後的形勢，已是愛莫能助。

而美國使館駐廣州代辦克拉克，則公開提出：「美國政府非常奇怪，為什麼在中國除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，再沒有別的有政治影響的組織。如果有一種第三勢力的存在，美國必樂於出面援助。」

很顯然，美國是想要中途換馬了。他們對國民黨感到失望，但又不喜歡共產黨。於是，他們希望在中國能出現所謂「第三勢力」。而桂系實權人物李宗仁則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。李宗仁是司徒雷登的好友。在美國的支持之下，他一舉通過競選當上了副總統。

這裏需要提一下南京四十八教授的「和平呼籲書」。它完全是司徒雷登一手策劃的。

一九四七年初，南京中央政治大學新聞系部分畢業生和在校同學辦了個周刊，叫《大學周報》，由胡適題字。到一九四八年初，該刊既無讀

者，又無經費，面臨停刊的境地。這時刊物改組了，由當時在《中央日報》主筆室任主筆的胡南林擔任總編輯。此人也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生，對中間路線頗為熱中。這時正是李宗仁參加競選副總統，胡南林也頗表贊同，於是就托人向李宗仁請求資助，並表示願意為李氏競選廣為宣傳。李宗仁當時給了胡一筆款子。胡南林有了這筆錢，又有了政治靠山，就想大幹一番，遂即把四開報紙週刊的《大學週報》改為雜誌週刊的《大學評論》。這是一九四八年五、六月間的事。

與此同時，司徒雷登對《大學評論》也很關心，並給了幾百美元。有一天，《大學評論》的社長倪青原（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）對胡南林說，司徒雷登先生要我們發動學生運動，要我們知識界的第三方面人士都行動起來，金大一定要爭取和中大合作。當時，司徒雷登最關心的是兩家雜誌，一是北平的《新路》，另一個就是南京的《大學評論》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，倪青原讓胡南林起草兩封信，一封是給毛澤東，一封是給蔣介石。信的內容是按照司徒雷登所規定的。兩封信寫好後，又送給司徒雷登修改。然後再去找人簽名。

經過一番緊張的忙碌，十一月中旬，《大學評論》刊登了南京四十八教授（主要是金陵大學的，也有一小部分是中央大學的）為呼籲和平給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兩封信。這兩封信的發表，在當時社會上頗引起各方面的重視，但由於形勢仍急轉直下，這兩封公開信也只不過是洶湧波濤裏

的一個小小的浪花而已。

李宗仁經過和司徒雷登多次長談之後，堅定了搞「第三勢力」的決心。但是，礙於自己代總統的地位，不便出面。於是他就任幕後策動，捧出前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，組成了一個所謂「自由民主大同盟」。但由於局勢基本上已成定局，所以這個組織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，不久便散伙了。

大勢去矣悄然返美

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李宗仁丟下南京乘飛機跑了。但作為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沒有走，作為傳教士，作為他本人更是不願意走。奉美國國務院之命，他暫時留在了南京。

司徒雷登耐心地等待着。等待什麼呢？是等國務院的通知？是期待局勢的回轉？他茫然不知。現在，他經常到寧海路五號原馬歇爾公館去走一走，那裏靠近教會，離金陵女大也很近，又是接近外國人的區域，或許能有所得。

在這些日子裏，他安步當車，差不多跑遍了南京城。他在尋找熟悉的地方，他在尋找所熟悉的人。真是不可思議，根本沒有人理睬他；人們像變了樣似的，舉着小旗子在大街上遊行，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不動了，一杆大旗後面走過來一支隊伍，呀，那不是燕大的校友會？怎麼今天也……？他驚訝了，不由地感到一陣愴然，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感使他失去了往日的心理平衡。

司徒雷登感到孤寂、冷落和最可怕的——衰

老。幾個月來，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，汽車的「使」字牌被拿掉了，並且要一律登記。美國使館的十五輛汽車限制到僅能通行一輛，使館人員只得整日閉門不出，有的人在收拾行裝，準備回國。

他不想再出去走了，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靜靜地坐着，呆呆地望着「燕大」校友贈送給他的紀念品出神。教育部的「一等褒獎狀」已經有點發黃，那是一九四六年元旦為表彰他在「燕大」服務有功而頒發給他的。現在，他默默地把它取下來，放在箱子裏。

他感到精力盡，不再像往日那樣精力充沛、異常活躍了。這段時間來，他通過各種渠道同共產黨的機構進行接觸，但一切的努力都失敗了。他想到，個人恩怨榮辱，可以視若浮雲，而美國利益毀於他手，那是作為外交官的恥辱。現在，他變得寡言少語了，甚至在美國《紐約時報》記者李普曼和他的女祕書的婚禮上，作為證婚人，他連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司徒雷登覺得沒有必要再留在這裏了。他的離境申請很快就被批准了。離境前的折騰也够他心煩意亂的，離境先要申請，再到外僑科登記，批准後辦理手續，最後還要登報聲明，所有這一切都得自己去辦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這一天，司徒雷登懷着悲哀的心情，默默地踏上了飛機舷梯。

晚年生活倍感淒涼

司徒雷登回到了華盛頓，一時沒有固定的住

宅，先由國務院安排，暫住在「五月花」旅館。這時，他儘量避免會見記者，其行動亦不為朋友所知。因為他要先見過總統，以了解應該如何發言，如何接受記者的採訪。

在這之後，司徒雷登常常到美國各地發表演講，但並不是談美中關係。他是個基督教徒，主要講話多是一些祈求世界人類平安無事的內容。

司徒雷登在美國沒有親人，孑然一身。曾是他私人顧問的傅涇波，同他關係一直很好。傅涇波拿出私人積蓄在華盛頓買了一所較寬敞的兩層樓的住宅，接司徒雷登與他們合住，就像一家人一樣。

司徒雷登的夫人在他四十初度即捨他而離開人世。後來就葬在燕京大學校園裏。自此，司徒雷登每天早晨起身後，必先到夫人墓前靜坐，讀《聖經》一小時，然後才回去用早餐，再去辦公室處理事情。

回到美國之後，他到南方老家去時，每天早晨在他們度過蜜月的那條小路上，總是漫步半小時；在華盛頓時，也是在早晨起身後讀《聖經》半小時，以悼念亡妻。

有一天，司徒雷登在火車上突然中風倒地，後被送入醫院，因搶救及時，又經醫生精心治療，病體居然得到恢復。其實，司徒雷登在回國之後，心情一直鬱鬱寡歡，再加上孤寂，身體已日趨衰弱。

一九五六年，在美國的燕大校友和朋友，為司徒雷登舉行了八十大慶。一些京戲愛好者還商定，要在慶祝生辰時唱一堂會戲《遊龍戲鳳》。

有數百位來賓前來看戲並進晚餐。很遺憾的是，司徒雷登本人因病已不能來看戲了，但他却非常喜歡這種中國式的慶祝方式。當來賓向他表示祝賀時，他還能辨認出所有的人，並用英文、中文叫出他們的名字。要知道，過去他在燕大校園裏遇到同學時，或在貝公樓大禮堂講話時，往往是自講自譯，講一段英語，隨即自譯出一段漢語

，交叉流暢地講着，漢語裏還夾着文言詞兒，略帶些山東口音，這是他的特具風格。
一九六二年，司徒雷登在回到美國之後的第十三個年頭，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，終年八十六歲。規模盛大的追悼會是在紐約舉行的。會後，骨灰盒由傅涇波捧回華盛頓，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寢室的案頭，始終也沒有送去安葬。

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

「訂閱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